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陶德麟、汪信砚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解释学之维



The Hermeneutical Dimens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皮家胜 著

Karl Heinrich
Mar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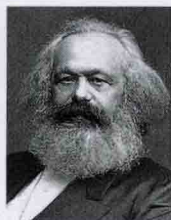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陶德麟、汪信砚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的解释学之维



The Hermeneutical Dimens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皮家胜 著

Karl Heinrich
Marx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之维/皮家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01-013932-6

I. ①马… II. ①皮…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843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之维

MAKESI ZHUYI ZHEXUE ZHONGGUOHUA DE JIESHIXUE ZHI WEI

皮家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932-6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路径选择	/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提出	/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5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选择	/11
四、运用解释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主要内容	/18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之根据	/2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可理解性	/23
第二节 人类普遍存在的“理解力”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解力”	/4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历史背景	/55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历史背景	/6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理解间距”问题	/83
第一节 “时间间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84
第二节 “空间间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06
第三节 “语言间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31
第四节 理解的客观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检验标准	/14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解释学循环”问题	/16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中的自身意义循环	/16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理解者对自我存在意义的理解 循环	/170
第三节 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其“前理解”之间的	

循环 /177

第四节 理解循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运行逻辑 /187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视域融合”问题 /20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解释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20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视域融合 /20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对它的各种阐释的多重融合 /21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视域融合”中实现其可能性 /22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解释学应用”问题 /23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用中获得理解的过程 /23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用中获得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24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解者主观际间关系的过程 /250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应用中筹划中华民族未来的过程 /261

第六章 分析与反驳 /27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根本不可能? /270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流失”?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回到马克思”? /27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传统思想化”还是“让马克思走入当代”? /285

第四节 李大钊、毛泽东是民粹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者? /299

主要参考文献 /312

导 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路径选择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在理论和学术界可谓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参与讨论的大多数人对这一命题本身是认可的,也对它做了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要大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中还有学者更是主张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去规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哲学研究。但无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用这一范式来规范整个中国的哲学研究,其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的合法性及其展开与实现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问题的讨论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也才是有效的,否则基础就不牢固,一切讨论也会趋于无效。就像我们今天,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个命题,但这一认可在程度上不见得是毫无保留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在人数上的大多数恐怕也主要是指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倡得多,讲得多一些,而另一些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者们甚至也包括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一命题就表现出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甚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本身都还存有疑虑,有些人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命题。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既不排除有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个别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它进行了十分有益的研究;也不排除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别或少部分学者对此并不在意,也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甚至对命题本身还持反对态度。这里面的情形比我们的想象或许要更加错综复杂一些。不管怎么说,即使人们都认同这个命题,但在另外的一些问题上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展开如何实现的、

有何经验教训、未来的前景如何等就会立刻表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和提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就更不可能达成一致,如此我们何以能够齐心协力地开展一场有成效的、保证其健康发展方向的推进运动?又何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哲学研究?这就是我在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的基本理由和主要思路。容我做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提出

把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讨论所形成的各方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包括否定、怀疑和肯定三种。发表否定看法的学者主要是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他们主要是从哲学的一般性和共同性这样一个角度来给出否定意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一种即以普遍事物为特征的哲学,不存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如果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哲学,根据现代翻译理论,它们彼此也是无法理解的。因此,要把一个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化为另一个民族、国家、地域的哲学,这种命题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是不可能的。给出否定意见的不仅有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而且还有部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中国哲学则不是科学,两者不可能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中国化。怀疑者则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忧虑:一方面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流失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他们将此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消极面”;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担忧,他们将此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副作用”。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消极面和副作用,他们认为不仅要对这一命题进行更加严密的考订,而且要对该命题采取慎提慎用的态度。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持肯定观点的人虽然居多,但他们肯定的理由又各不相同。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

处,两者能够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持这种看法的大都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当然也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另外有人则从哲学形态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加以肯定,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前近代哲学,两者都与近代哲学处在对立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点,因此,两者能够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不称其为问题了。更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则从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有必要对之展开深入研究,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基地之上,等等。将上述种种观点罗列出来,不是要对它们一一进行分析评判,这项工作笔者将放在后面去做。这里只是要说明两点: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有一个基本问题存在,这就是“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且种种争议亦如我们目前的情形一样永不会停止,各种推进工作当然也会由于基础性问题没能得到解决而发生动摇以致毫无成效。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个是否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流失,甚至对之采取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也难以避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采取怀疑和困惑的态度。这两个问题显然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更为根本,它不仅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立与否,而且也决定着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延伸,没有后者,对前者的回答是不充分不可靠的。两者相互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切争论、怀疑、困惑、误解和错误结论都只有在这两个相互联系,亦可以说是二而一的问题得到正确有效解决的基础上才能平息和消除。现在学术界之所以歧见纷呈,就与这一问题还远未得到正确有力的解决有关。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并对之展开深入研究不仅是解决国内学术界的纷争、达成共识的需要,而且也是消除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及其种种消极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需要。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

化是否成立的最基础性的问题上,国外学者表现出来的是少有的一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许多相似相通之处,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西传到欧洲的产物。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人接受,实现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它又回到了中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直截了当地这样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说,“没有人不懂得一些儒家传统而能够了解蒋介石或毛泽东的”^①,也就是说,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的思想传统,谁就不可能懂得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史家史华慈则不加隐讳地说道:“李大钊的哲学完全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之内。这里人们可以发现,虽然经常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李大钊仍然是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②他们的这些看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如美国当代学者窦宗仪就完全重复着李约瑟的观点,他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大同小异”,他在谈到人的本性时,说道:“儒家的回答与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好像是一致的。”在谈及关于人的完善性问题时,他又说道:“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一致的。”^③他还围绕这些结论和观点写下了一部专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德国著名汉学家皮特·奥皮茨从1969年到1974年,连续出版三部专著,他要极力阐明的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儒学出发成长起来的,从儒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④美国学者斯拉姆在谈到毛泽东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说道,由于毛泽东的极其自信(这种自信显然既与他相信自己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关,又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有关),因此,他“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确实,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现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中,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53页。

② 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01页。

④ 参见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前,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①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毛泽东思想与儒家的关系要远比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密切得多。类似的言论俯拾皆是。对此我们或需深入这些说辞的背后,去看看他们到底要说的是什么。但不无遗憾的是,在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之前,我们就把这些观点当做“真知灼见”不加分析地给完全接受下来了。其结果就是跌入他们给我们设下的陷阱。

国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似相通方面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据,是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逻辑的。这就是一旦这一点被坐实,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譬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做是中国传统思想化,儒学化,甚至是封建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做只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把李大钊、毛泽东等不是看做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等等,就顺理成章,一点都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国的学者没有深入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却跟着国外学者唱起同样的调子,这就上当了。

要避免上这些外国学者的当,我们就既要向他们学习,又要同他们保持警惕和距离。之所以要向他们学习,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保持了浓厚兴趣和细腻的研究风格,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这就是他们把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的精力始终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以及这一可能是如何转化为现实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方面;之所以要对他们保持警惕和距离,是因为我们不能被他们的研究方式或路径牵着鼻子走,更不能接受他们的错误观点和结论,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采取新的方式或路径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得出更符合实际的、正确的,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结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实为我们今天深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哲学研究所必

^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是否就是笔者在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一基本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基本问题,抑或没有,等等,这些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①单从文章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许多基本问题的。这是一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轻率。在笔者看来,一件历史事情或过程以及由之凝练而成的命题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会随历史事情或过程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转换,但是它围绕的中心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且不会变化转换,否则,这一历史事件或过程就已经终结,而由之而来的命题也不再有人给以更多的关注。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贯穿整个事件过程之始终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问题发生了变化转换,而这一问题却只能是它自身,否则就不能是基本问题,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有问题的“源”问题。所谓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在此问题之上产生的,没有该问题的存在,其他问题也就无以存在,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二是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式规定和影响着对其他问题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其三,提出一个问题总是预设了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目标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群中,只有那个能够反映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的问题才能被我们视为基本问题。根据以上三点,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不是多个,也不是两个,只能是一个。因为能够贯穿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作为源问题的、规定我们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目标的问题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它们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截然分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这

^① 参见袁吉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

一历史过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对这一实现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论思考,以使这一过程能够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更加健康地开展。也就是说,何以可能是以现实的实现过程为基础和标的的,在历史与逻辑展开之序列上,是历史在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显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上才能够提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是要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内在逻辑规律。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其意不在历史本身,而是逻辑规律,而把握规律显然也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历史运动本身。两者互以对方为目的,又共同服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共同目标。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看做是由两个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

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这个二而一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仍然继续,我们就要对这一过程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探讨,这也一定会以提出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一问题表现出来。只有通过这种不断回到根基处的提问和保持反思的态度才能够保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清醒的意识并保证其健康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问题会发生变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也要随时代、实践、各门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基本问题却伴随这一过程的开展而始终不会改变。第二,何以可能与如何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不仅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一切问题是否成立,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第二方面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各种问题将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解决。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问题中,唯有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才真正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是在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一发问中得以体现和敞显开来的。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显然不是针对这一历史过程本身的发问,因为它已经处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如果针对它本身发问,就没有任

何意义。这里如此提问,一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发生的各种条件,只有弄清楚这些条件并提供它们或使之成熟,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的;二是要对我们的目的和意图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必须要由一定的主体加以推动才能开展的历史运动,这里必然有主体的意图和目的参与其间。这一主体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只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图和目的反映和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具有合法性。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包括对我们自己目的、意图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追问。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也不是针对这个实现过程,而是要透过这一过程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规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更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保持其健康发展之方向。总之,我们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所进行的这一发问隐含着我们的目的和意图,是清楚不过的了,而真正的提问也一定如此。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问题之所问中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这是真正的意图所在,发问到这里达到了目标。”^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有无区别,区别何在?这是没有得到认真厘清的问题。一些论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两者谈不上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的传统哲学结合,那我们的确也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不加区分的看法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的严格界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并为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者制造了口实。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析命题,或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页。

者前者完全可以涵盖后者,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后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出并倾注热情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容,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研究范式。两者的区别可以从学科分类、命题意蕴、学术旨趣和侧重内容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学科分类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政治学,按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政治学和伦理学是实践科学。实践科学不是关于思想自身的科学,而是行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实践科学,它侧重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党的行动路线和方针政策。可以这样说,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部分及其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是分别突显出来的。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或者说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正确的做法不是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有多么系统、连贯和完整等,而主要是看我们学来的、拿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针对性,能否解决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由于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紧迫性,我们也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本身有过多的反思,因而也不可能提出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类特别课题化的问题。这类问题大概只有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做哲学的或理论化的思考这个阶段才能提得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不同,它虽然也有与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要与实际结合,但它一开始就不再分属实践科学的序列,只能属于理论学科。理论学科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的,它必须对作为思想的自身整体进行研判和反思。我们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对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所涉及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判和反思,这显然也只能是理论化的活动。在这一理论活动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类问题,并且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其前提性问题做批判性考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命题意蕴方面来看,当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反对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

因此,促发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全是实践方面的动机,它要解决和实现的也主要是实践问题和实践目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说源泉仍然是实践,但主要的和直接的不是出于实践动机,而是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的反思这种理论活动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直接就源自于我们对教科书范式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深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要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创造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本质又具有中国的内容和形式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这里,理论的动机要强于实践的动机,理论的目标要大于实践目标。基于这一目标和动机,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类基本问题并对之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为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可靠的基础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从学术旨趣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来的,倡导者们不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做一种中国式的学理分析,而是要对它加以运用,主要就是看它是否管用,这一点毛泽东说过,邓小平也说过。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们即使有学术方面的兴趣,条件也根本不允许他们躲进书斋做专门的学问。他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有精到的把握,但却不可能涉猎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经典著作,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其他各种思潮、各种学说和理论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发现其得失利钝,等等。基于此,他们也就不会提出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这类较为学术性的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也主要是由学术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说这一过程很早就开始了,但明确提出这个命题并被学术界所认可的确只不过是20世纪的90年代的事情。以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说主要只是传播、通俗化,即使有像毛泽东这类成功的“中国化”的范例,也终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下完成的,缺乏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到了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学者们

^①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表达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是要从学理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究竟是如何被中国人接受和掌握的,是如何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作用的,是怎样对中国人的思维习性和精神质素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如何在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实际和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确立它作为世界哲学的地位、保持其现代性并发挥其巨大影响的。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十分有必要向它提出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

从侧重内容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于“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相互吸引和包容。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很多人都会说到中国社会实际的需要,我们前面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部分及其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是分别凸显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与中国文化之间往往有一个相互“配合”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还保留着它的影响。如有的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匹配”为由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有人又以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为由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都是受了这种意识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强调理论与实际、理论与民族传统文化要“匹配”的观点,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一种反思的或理论的态度而言,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侧重于理论和学术方面的,我们需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来对面对现实整体和作为整体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这里不再是相互吸引和包容,而是批判、否定、改铸、超越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种在内容方面的重要区别也表明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路径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是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或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的,我们既可以选取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或视角,也可以将各种方法或视角融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

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得较多的是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当然也可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历史的方法近乎孔子的“春秋”笔法,就是通过描述,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和考证,达到对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问题的“应答”。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此之谓也。用历史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要分三个层次进行。第一,从世界史、人类史层次上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好,都不是在中国一个国家、中华民族一个民族范围内进行的,它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整体的精神把握,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没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原先作为可能性而存在的人类整体也就向着现实的人类整体演进,从而那些对形成人类整体有帮助的思想,特别是那些直接体现人类精神思想和理论也就获得向世界传播、被各民族所掌握和运用的现实性。认为以普遍事物为对象的哲学只有一种的看法虽然本质上是正确的,但这种哲学的真正出现,它的向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都只有在世界由国别史和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中才具有现实性这一点却是持此种观点的人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的。具有人类整体精神的古希腊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只有在近代才由世界各国所继承发扬并实现世界化。认为不同民族、国家的哲学不能相互理解的看法就更不对了,只要我们不单从孤立的语言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人们对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哲学的理解问题,而是从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 and 实践整体上观察世界的发展,我们就必定立即抛弃这种错误看法。第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层面进行研究。如果没有近世中国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登上历史舞台,没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没有我们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反思,我们也就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第三,从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的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的历史层面进行研究。虽然我们不能像国外学者那样仅仅从思想文化层面去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但从中国思想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往过程中,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历史发生和